

# 过往的辩思

赵培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INKING FRAGMENTS  
IN THE PAST

# 过往的辩思

赵培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THINKING FRAGMENTS  
IN THE PAST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往的辨思 / 赵培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 - 7 - 5203 - 2499 - 1

I. ①过… II. ①赵… III. ①时事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D609. 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8605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孙萍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王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众多前辈和大家经常会用“清算”一词向自己的往昔岁月告别，或与旧时代的思想活动划清界限，抑或对与他人的论辩和争鸣做出了断。

自 1987 年到 2016 年，我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院党组办公室（研究室）、政治学研究所、院办公厅、文化研究中心工作。1987 年从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哲学研究所工作，除了在该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约一年时间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科研组织处工作，先后任外事秘书和从未以书面形式确认的“科研处负责人”“所学术秘书”。这是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差事。1989 年，我被评为助理研究员，1994 年被评为副研究员。在科研处工作期间，我还与其他同事一起兼职编辑《中国哲学年鉴》和《世界哲学年鉴》。大约在 1998 年，根据院领导指示，我的工作关系留在哲学研究所，人到院民主问题研究课题组，一开始负责课题组简报的整理和撰写，后来参与有关书稿的撰写和修改。在课题组工作的几年里，虽然常常不分白天黑夜连续数十天住在宾馆里或在京外出差，但有若干机会与院内外不少学科领域的前辈在一起，向他们学到了许多为人为学的道理。时至今日，有的前辈已经故去，有的已迈入耄耋之年。虽不曾再次协作，也时常忧郁凄伤，但仍觉得那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回忆

## 自序

的时光。

大约在 2001 年，我的工作关系正式转到院党组办公室（研究室），主要从事相关文件和领导讲话稿的起草撰写工作。其间，我的工作关系曾经转到政治学研究所，名义上是该所政治理论研究室的人，实际上仍在院机关工作。后来，党组办公室（研究室）并入办公厅，人也随之成为办公厅的人。一直到 2016 年正式离开，无论是作为党组办公室（研究室）正处级学术秘书，还是有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的名头，十几年的主要工作甚至说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年百余个上级领导机关、院党组、院领导交办文稿的起草和撰写。在主持或参与起草撰写的文稿中，自觉有不少文稿的学理性还是比较强的，但往往被大多数研究单位或专家学者排除在学术成果的范畴之外。此外，在院党组办公室（研究室）和办公厅工作期间，除了承担繁重的文稿起草撰写工作，我还是《思想理论动态简报》和《理论与决策参考》两个内刊的主要编辑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是我彻底离开院机关后的去处。该中心虽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半实体研究机构，但自成立起至今一直是由哲学研究所管理的。所以，去文化研究中心，也就是回到了哲学研究所，回到了自己学术梦想开始的地方。在该中心履行“执行主任”的职责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还没有清晰了解那里的情况，也尚未被那里的各位先进真正接纳和认可，在完成几个上级交办课题后我又再次离开，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站，也是目前唯一的一站，恐怕也是此生的最后一站。数十年来，我虽身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之中，但绝大多数时间是作为一名学术旁观者存在的，辜负了老师，辜负了父母，也辜负了自己。虽然始终认为读书才是自己的正道，也一直仰慕“学者”这一称号，但实事求是地

说，自己至多是半个学者，只不过没有断了学术的情结而已。除去这一半，另一半是什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完全可以说清楚的是，自己走了一条本不属于自己的路。万幸的是，我没有在这条不属于自己的路上一直走下去，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些重温年轻时怀抱的学术梦想的时间。

如果要做一个划分，收入这本书的文章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我自大地称为“学理探索”，一部分被人读作“时政点评”。有的曾经公开发表过，有的则是第一次变成“铅字”，但我大抵遵照了“原文照排”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几篇文章系与其他领导或同事共同署名，为了保持完整与全貌，本次全文收入，未作各自承担内容的精细切割与划分。

2007年以来，我为《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人民论坛》和《大地》杂志及其他报刊撰写了一些小文章，从“半个学者”的视角对有关时政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些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确实是我意料之外的，因为写这些东西毕竟不是自己的专长。我虽然对自己说出去的每一句都敢于负责也应该负责，但也担心某些观点和言论给编辑们招惹什么是非。记得《解读“个性官员”现象》一文在《人民论坛》发表后，有位领导同志向杂志社查问作者“肖木”何许人也。据时任杂志编辑康培先生说，杂志社做出的可以理解的第一反应，就是组织人员认真审读了几遍该文，但总也看不出其中存在什么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位领导同志又向社科院的领导查问“肖木”的具体工作单位，但因为是“笔名”，而且我也不曾对谁提起过，结果当然只能是“查无此人”。最后，还是《人民论坛》杂志社觉得有些对不起我似的“披露”了我的“真名”。不久，我接到电话通知，有幸到那个令诸多官员肃然起敬的领导机关，聆听了领导同志关于我那篇文章的批示，也做了那

## 自序

个机关内部刊物的特约评论员。但是，我确实枉为“特约评论员”这个称号，因为没有为人家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谁都不能假设历史，也不可更改历史。之所以自称“过往的辨思”，只是希望把自己作为一名学术旁观者的只言片语汇集在一起，跟自己的往昔岁月告别，但确实没有资格使用“清算”一词。无论是与非、对与错，无论平和与激进、全面与偏狭，只能留待感兴趣的读者去评判。

是为序。

# 目 录

## 时政点评

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	(3)
制度保障才能防止“官场秀” .....	(8)
人民没给你这个权力 .....	(12)
认真履行特约评论员的职责 .....	(14)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过“苦日子” .....	(17)
灾变之后的反思 .....	(20)
让网络政治更具“中国特色” .....	(23)
直面并不虚拟的网络世界 .....	(25)
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忧虑与期待 .....	(31)
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比风暴效应更重要 .....	(36)
严查“小节”体现问责底线下移 .....	(40)
新定位再出发	
——县委书记的责任和使命 .....	(45)
为百姓解难为国家分忧 .....	(48)
离任时，读出高官的品格	
——解读官员的离任感言 .....	(50)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	(55)

## 目 录

坚持党管人才 迈向人才强国 .....	(60)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乳山探索 .....	(63)
制度创新的“龙游”亮点 .....	(67)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指南 .....	(69)

## 学理探索

只讲“对立”还不够 .....	(79)
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的战略意义 .....	(8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 .....	(91)
解放思想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利器 .....	(109)
科技发展的伦理约束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	(118)
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	(123)
什么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 .....	(129)
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	(133)
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 界限 .....	(147)
找回城市的个性与灵魂 .....	(159)
中国文化的重建及“最后的学者” .....	(166)
人,虚静与恬淡地生存 ——老庄哲学对现代生活的矫正 .....	(180)
国外知名学者和政治家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 .....	(192)
关于民主的“东西”之争 .....	(240)
文化个性与国家品牌战略 .....	(255)
品牌创新与文化生态 ——国家品牌建设的文化驱动力 .....	(281)

## 时政点评

---



## 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近些年，越来越多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官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媒体热议的“个性官员”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敢于在审计风暴中将国家部委和大型金融机构的严重违规问题向社会公开披露、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有敢于“说狠话”、被誉为“灭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有敢于“乱世用重典”、数次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环保风暴”、自认“仗义”和“霸道”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敢于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点名痛批天津等八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此外，还有一批主政一方的基层和地方官员，如敢于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政地党政机关干部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敢于改革“惯性制度”、掀起党内基层民主政治改革风暴的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

\* 原载《人民论坛》杂志（政论双周刊，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2007年第18期，署名“肖木”。

记李仲彬；敢于“起沉疴、下猛药”整肃陈腐的地方吏治的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敢于发出“另类”声音、誓言把房价压下去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等等。

现在，我们尚无从考证“个性官员”一词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大概在两年多前，它开始进入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词库，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谈论中国官员时使用频率甚高的词汇和范畴。被归入“个性官员”之列的省部级或地方官员，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因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而遭到一定程度的非议，但他们大多受到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赞赏与好评。

### **是个性，还是应有的本性和秉性？**

综合人们对这些“个性官员”的界定，不难看出他们具有如下这样或那样的“个性”：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把官位和乌纱置之度外。笔者以为，与其说这是上述官员的“个性”，毋宁说是或应当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本性”或“秉性”。

其实，我认为，这些“个性官员”本不想被媒体和社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本不想成为被罩之以各种耀眼光环下的什么英雄，他们只不过是说了自己作为人民公仆应该说的话，做了处在他们那个职位应该做的事。从大的方面说，他们捍卫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维护的是制度和法律的尊严。囿于传统的、既有的官场规则，他们在中国庞大的官员队伍中仍属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正是人们称其为“个性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 “共性”到“个性”的突围

有人以为，这些官员虽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但他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触犯和挑战了事关政治生命和前途的官场潜规则，违背了数千年来几乎无人对此提出质疑的官场共识。

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先人不断创造出诸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至理名言”。千百年来，这些都被尊为做官或从政的座右铭。即使在当下的中国，行走于“官道”之上的众多有“理想”或“抱负”者，甚至一些刚刚涉足“官场”的政治幼童，也都热心于研习、掌握最基本的为官常识和行为准则：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察言观色，谨言慎行；不苟言笑，老成持重；难得糊涂，回避是非；低调为人，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等。

也许正是由于数千年遭受儒家思想浸润和陶冶而形成的中国官场文化，人们对这样一些官场规则和官员“共性”已经习以为常，李金华、潘岳和张保庆他们才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和弥足珍贵，社会才把他们说当说之话和做当做之事，看作对官场规则的挑战和突围。

## 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这些真正体现人民公仆秉性的所谓“个性官员”，以他们在阔大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卓越的表现，感动着期盼吹来政治清风的每一个人，感动着整个中国。

李金华担任国家审计署领导职务 20 多年来，一再推出爆炸性的审计报告；潘岳走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位置，不仅主导了在全国刮起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环保风暴，而且极力坚持和推行绿色 GDP 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重要贡献；张保庆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冲冠一怒，给予若干党政部门、教育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重重一击，无疑加快了贫困学生助学贷款问题的解

决；李毅中在全国各地近乎奔命般的行走，终于唤起了各级党政官员和全社会对安全问题的起码重视……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正是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 **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

有诸多媒体或评论认为，“个性官员”的出现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已经进入 21 世纪，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个性官员”产生的这样一些时代条件，这一现象也许正显示出我们在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失。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被专制和等级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环境之下，人们往往期盼明君贤臣的出现，期待海瑞和包公那样的“好官”，而很少对制度提出质疑，很少把注意力放在制度或体制的变革之上。这也许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一个内在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的社会发展没有经历过比较完整和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过 50 多年，因此反对并不断涤除封建专制时代的残余影响，仍将是中华民族一项长远的历史任务。在已经进入 21 世纪的当代中国，“个性官员”的出现无疑推动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积重难返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但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甚至几十个像李金华、潘岳、李毅中和张保庆这样的“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依靠制度解决问题。与所谓“个性官员”相比，制度更重要、更根本，更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同志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指出：“制度好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没有好的制度，纵有千百个李金华、张保庆们这些“个性官员”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李金华、潘岳、李毅中和张保庆们才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良好环境，才会更率真、更畅快地展现作为人民公仆的本性和秉性；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人民期望和需要的“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也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某些对封建时代的“人治”仍恋恋不舍的官员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恣意膨胀的“个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制。

## 制度保障才能防止“官场秀”\*

我们党不仅肩负着领导人民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历史任务，而且还必须领导人民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制度，创造出比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一切政党更高的政治效率。经过 60 年的不懈探索，我们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框架内，有关选举产生和监督制约行政官员的制度机制、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和健全，党内关于选任、监督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纪律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 选好人，用好人，必须以制度创造更高政治效率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党和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把制度建设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他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所说的更高的政治效率，是指我们的政治制度包括干部制度能够使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的运转更顺畅，能够保障更强的执政能力和更高的执政水平，

\* 原载《人民论坛》2008年第6期，署名“肖木”。收入《官场生态》，人民论坛杂志社编，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